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十六）

江燦騰

不過，為求解說方便起見，此處仍循著丸井的這條線索來理解。

因首先必須考慮的是：丸井在推動「南瀛佛教會」的組織成立時，他的行為有無和總督府的宗教政策牴觸？假如有，則「南瀛佛教會」為一「違法」組織，其不能長期存在，將是可以預期的。而假如是「合法」的，那麼要問：像「南瀛佛教會」這樣一個以臺灣佛教徒（包括在家、出家）為主體的「全島性」聯合組織，有何必要性由身為總督府社寺課長的丸井來負責推動？

按說，丸井到臺灣來，先是擔任翻譯官兼編修官，後來則是執行總督府在「西來庵事件」爆發後所進行的調查。不過他其後雖擔任「社寺課長」一職，可是日本宗教法律規定和歷任總督府的訓示，皆顯示臺灣的宗教信仰，除非過度迷信或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否則官方是要尊重當地習慣和加以保護

的。

因此，丸井本人不可能在法律的規定之外，過度的干預屬於私人組織臺灣佛教事務。換言之，「南瀛佛教會」的成立，不論丸井如何熱心推動，乃至在成立後兼任「會長」，也無法改變它是屬於「民間宗教團體」的性質。

假如這一立場不能改變，那麼，身為總督府「社寺課長」的丸井，假如要推動臺灣人的佛教組織，則在他著手之前，必然有相對的內外環境需求，來促使他採取行動。否則他的這一措施，就成了不可解。

因而，若要說明「南瀛佛教會」成立的相對內外環境需求，此處仍須先再簡介一下當時臺灣島上所出現的新潮流，和各階層所受到的巨大影響。

由於時值第一次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戰後和平計劃中，所提出的「民族自決」思潮，正瀰

漫全球，故對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民眾鼓舞甚大。而臺灣在日本統治下，雖已歷26星霜，但政治、法律、教育和經濟等各方面，都受到明顯差別待遇，因此對「民族自決」的呼聲，自然反應熱烈。何況當時在亞洲地區同屬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殖民地，曾爆發大規模的「獨立運動」，以及在中國大陸也掀起反日的「五四運動」，促使日本統治當局必須對這樣的大變局有所因應，否則在臺灣的反抗運動，將無可避免地會隨之爆發開來。

而事實上，當時臺灣的留日青年，在「南瀛佛教會」籌組之前一年，已在日本組成「新民會」，推林獻堂為會長，要求日人讓臺灣人高度自治。機關刊物《臺灣青年》亦在當年（1920）創刊，並將影響力自日本傳回臺灣本土。而「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1921），更使知識份子的文化下鄉運動，在臺灣全島展開，直接對民眾展開思想啟蒙的工作；同時「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持續進行著。

但若就日本統治後的臺灣宗教界來說，其實從明治時期到大正年間，最活躍、最獲民眾愛戴和最受日本政府重視的，其實是先天派的黃玉階而非佛教僧侶。黃氏在日本據臺之年（1895）已46歲，除熱心於先天派的道務開拓之外，黃氏更以精通醫術

和熱心公益聞名。

日治初期，臺灣地區流行各種傳染病，如霍亂、鼠疫等，黃氏不但救活千人以上，更撰文告訴民眾預防或治療之道。此外黃氏還協助推動民眾剪辮和改天足，頗有功於新生活習慣的提倡。因此黃氏生平深受各界推崇，除被選為仕紳、評議員和區長，更影響青年輩習醫的風氣；例如前臺大醫學院長杜聰明博士，即是仰慕黃氏並受其影響才習醫的。

而就宗教事業來看，他除在全臺拓展先天道教務外，還倡導「齋教」各派和曹洞宗聯合，因此大正5年（1916）籌組的「臺灣佛教青年會」，黃氏列名8位臺籍發起人之首，隔年並被推為2名「副會長」之一（會長大石堅童和另一副會長木村泰治皆日籍）；而基隆月眉山的江善慧（1881～1945），則擔任「幹事長」。可見江善慧這時的影響力，遠不如黃玉階¹。由這些說明裡應可得一印象，即「齋教」在當時是強勢「團體」和正統佛教也能和諧共處，而不發生「正統」對「異端」的互相排斥問題。

可是，在「西來庵事件」之後，臺灣佛教界如何走出此一風聲鶴唳的驚恐震撼呢？²因這並非

靠黃玉階一個人就能加以改變的。這需要有更強而有力的振奮情勢出現，然而官方是不可能提供這一巨大動能的，又如何能無風起浪或憑空出現呢？恰巧，「始政20週年」的首次臺灣博覽會的舉辦，正好提供了一次引爆的機緣，於是意外地促成了臺灣民眾心靈的覺醒和轉機。其前後經過如下所述。

2. 臺灣新佛教運動的出現及其影響

大正5年（1916），恰為日本領臺20週年，又逢臺灣總督府新建大樓完成，故在臺北舉辦為期月餘的大規模「臺灣勸業共進會」。當時，總督府方面邀請英國籍的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bell, A.D.1871~1917在臺），擔任臺灣史專題的演講³，由總督府的翻譯官翻譯。另外，又有基督長老教會向大會申請設攤，欲舉辦佈教演講會。當時負責宗教事務的柴田廉認為，此事不宜獨厚基督長老教會，便知會佛教方面，亦可同時設攤舉辦佈教演講會⁴。於是，臺北佛教徒方面，這才臨時緊急架篷設臺，並調來人手登臺演講。

可是，由於基督長老教會的講者，首先不斷地在演講中嚴詞批判佛教的種種不是，引起佛教徒方面的不滿，決定也還以顏色。於是，以佛教徒林學周為主的演講會⁵，和以長老會牧師吳廷芳、陳清

義為主的演講會⁶，最後演變成互爭優劣、相互攻擊的宗教批判大會⁷，雙方你來我往，針鋒相對，誰也不願先服輸。林學周本人則是靠日本友人寄來日本國內著名學者批判基督教專號的《大國民》雜誌，以作為在臺批判基督教的參考資料，將日本本土的批判火炬，重新在臺灣地區燃起熊熊大火。

如此一來，由於雙方都力挺不肯退讓的結果，在那長達一個多月（35天）的「大演講會」裡，幾乎把全臺的佛教精英都匯聚到臺北都會區來助講⁸。因此佛教徒方面，不但未落下風，反而愈辯愈引來大批支持者的聽講和觀戰，並且無論在氣勢和聽眾人數上，都大大勝過對手基督長老教會的場面和表現。

而由於，當時像這樣能和一向社會地位佔優勢的西洋基督教互相激烈爭辯而絲毫不遜色的情況，對臺灣整個佛教界來說，乃是前所未見的嶄新經驗，所以「大演講會」的獲勝消息，不斷地振奮了全臺的佛教徒，甚至將彼等在「西來庵事件」之後，一直鬱積在心頭的卑怯和沮喪的陰霾，也一掃而光，宛如脫胎換骨般地，較之從前，開始更明顯地在臉上流露自信的光采。因這等於意味著：彼等從此不僅敢於向鴨霸的異教徒公開反駁，同時也敢

於在臺北都會區向社會大眾發出自己信仰的告白。於是林德林則首先撰文，將此次「大演講會」稱之為「臺灣新佛教運動之先驅」，可謂慧眼獨具⁹。

此外，由於在這次「大演講會」期間，有大批佛教徒前往聲援，響應極為熱烈，會後幾個主要的演講者，都受到了曹洞宗臺灣佈教總監大石堅童的激賞，立刻呈報日本的「大本山宗務院」，分別給予每位演講者一張獎狀¹⁰。

但此次「大演講會」（原名）的重要影響，是在會後成立了「臺灣佛教青年會」和創辦了「臺灣佛教中學林」。而江善慧在這兩樣重要的佛教事業中，皆擔任了重要的角色。茲說明如下：

一、「臺灣佛教青年會」是林學周首倡的¹¹，但江善慧不但列名「發起人」之一，而且是組織正式成立後的「幹事長」。根據〈臺灣佛教青年會規則〉第8條：「幹事長受會長指揮、掌本會應務會計等」¹²。當時任「會長」的，是「曹洞宗大本山臺北別院」的負責人大石堅童，為日籍。而江善慧則是業務的實際執行者。可見在此一新組織中，他已開始嶄露頭角，是臺籍僧侶中最令人注目者。

二、「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是臺灣佛教史上第一所正式的佛教學校。根據村上專精（1851～

1929）在《日本佛教本史綱》的說法，日本本土自宗制、寺法於明治17年（1884）規定後，各宗都劃分區域，辦理學校，其中曹洞宗除有「大學林」外，以「中學林」設30個為最多¹³。

但「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則是曹洞宗「臺北別院」第7任（1913～1920）佈教總監大石堅童，在任內極力促成者。大石堅童在明治40年11月至明治44年3月（1907～1911），已擔任過同一職務，是為第5任總監，與江善慧結緣甚深¹⁴。因此「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他自任「林長」而委由江善慧任「學監」¹⁵。（未完待續）

註釋

1. 其實，黃玉階亦是「御用紳仕」之一，故他不只是曹洞宗的大信徒，同時也和辜顯榮一樣，又是日本真宗本願寺派的大功德主（捐款者）之一。見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97。

2. 根據後來增田福太郎在獅頭山訪問「勸化堂」和「元光寺」的結果，可以確定幾點：（一）擴充或改建，皆在「兒玉、後藤體制」中後期。（二）在大正4年「西來庵事件」未爆發之前，是香火頂盛、遊客不絕之大好時光；但自「西來庵事件」爆發之後，因風聞有餘黨在山上藏匿，故警察常上山盤問和嚴厲取締，故遊客都為之裹足不前，朝拜香客從此銳減，再也無法恢復先前盛況。見氏著，《東亞法秩序序說——民族信仰の中心について》（東京：ダイモント社，

- 1942)，頁276-278。此外，如陳火是「南瀛佛教會」的創會要角之一，但亦曾遭受牽累被刑。見林學周，《臺灣宗教沿革志》，頁2。
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1965），頁119。講題是：1. 臺灣歷史資料。2. 荷蘭的臺灣佔領。3. 中國的臺灣統治。4. 日本最初的殖民地。
4. 據林學周本人的自述。見《臺灣宗教沿革志》，頁23。
5. 同上註。
6. 同上註。
7. 同上註，頁22。
8. 連雅堂本人（當時為臺南新聞記者），也北上登臺，助講三夜，以增氣勢。同註3，頁3。
9. 林德林，〈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南瀛佛教》第13卷第5期（1935.5），頁23。
10. 同上註，頁28。
11. 林學周，《臺灣宗教沿革志》，說明當時的活動真相。而該組織均籌備〈趣意書〉亦為林氏手筆。頁3。
12. 同上註，頁4。
13. 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收在藍吉富編，《現代佛學大系》第29冊（臺北：彌勒出版社，1984）。頁366。
14. 李添春編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123。
15. 此一「中學林」的發展和日後的名稱變革如下：（一）大石堅童是在大正4年開始籌劃，也就是在臺灣爆發「西來庵事件」後，開始考慮加強現代佛教知識，以消除迷信，而有了設「佛教中學林」的構想。初期的目標，是為了加強就學者的日語能力，以利銜接日本佛教教育，為曹洞宗在臺灣的發

展奠下更深的基礎。因此，初期的開辦經費，是由日本曹洞宗的兩大本山與臺灣曹洞宗僧眾及皈依信徒共同籌措。學制是採3年制，每年收學生25名，分本科和研究科2級。但日本本土的中學制是5年，因此在臺灣讀完3年，可編入日本山口縣（在瀨戶內地方，本州南部）曹洞宗辦的「多良中學」4年級就讀；畢業後，可進入「曹洞宗大學林」（即日後的「駒澤大學」）深造。（二）「臺灣佛教中學林」正式開學，是在大正6年（1917）4月10日，所以也稱得上是由大正5年的「大演講會」所促成的。初期招收的學生中，出家僧侶和在家信徒各其半。教授8人，臺籍僧侶和日僧，亦各佔其半。當時，靈泉寺江善慧的出家弟子，即有4人在「中學林」就讀。江善慧的大徒弟沈德融駐校幫忙。4個日籍教授，有2人才從「曹洞宗大學林」畢業來臺。但一般說來，皆學有專長。大正11年（1922），擴建校舍，改稱「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昭和10年（1935），採5年制，又改名為「私立臺北中學」。昭和12年（1937），學生增加，男生移至士林新址，原址改稱「修德實踐女子學校」。戰後，再易名為「私立臺北高級中學」。是臺灣佛教界所辦最悠久的一所中學。迄今校中猶有「善慧圖書館」以為紀念，可見江善慧和此「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因緣之深！